• 史海探幽 •

“三钱”与《自然杂志》

林凤生

近一年里，随着钱学森、钱伟长的相继去世，蜚声我国学术界的“三钱”已离我们渐行渐远，他们留下的空白将会在今后许多年里被我们逐渐感知。说来也是有缘，笔者供职的《自然杂志》曾得到过“三钱”的指导和赐稿，回忆起来倒也成了一段史话。

笔者是1994年4月《自然杂志》改由上海大学主办时被调去参加复刊筹备的。一天，校学报主编汪老师约我谈话说，原来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的《自然杂志》因经济原因已经休刊，上海市政府徐匡迪同志等领导觉得这样一本在学术界有影响的刊物就此休刊殊为可惜，经与钱伟长校长商洽决定改由上海大学主办，问我是否愿意加盟办刊，我同意了。开始筹备时，只有汪老师和我两个人，考虑到各种工作繁杂，征得学校领导同意，当年先休刊。在这段时间里我一面阅读《自然杂志》的历年过刊，一面处理杂志社原来积压的来信来稿。在交来的文档里我曾见过一封民科 (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草根) 的来信，信里说他的稿件已请钱学森看过，是钱老让他再把稿件投给《自然杂志》的，里面还附了钱学森给他的亲笔信复印件。我浏览了一下，见信的大意是来稿收到了，因不熟悉这方面的研究，建议将稿件转寄《自然杂志》，请他们组织专家审定云云。当时我看了好生奇怪，想《自然杂志》怎么这样牛！连大名鼎鼎的钱学森都会让他们审定稿件，不由令我肃然起敬。

后来，为了了解《自然杂志》的历史，实现刊物的交替和衔接，我先后两次登门造访了原主编贺崇寅先生，他告诉我说，《自然杂志》(月刊) 创刊于1978年5月，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主办，他任主编。创刊时明确了三条宗旨：“一是传播科学的新知识，二是支持科学上的新发现、新学说，三是扶持科坛上的新秀。”他还说这些观念并非他个人所为，而是得到了高人的点拨。办刊前，他曾赴京拜会了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先生，请郭老为即将创刊的《自然杂志》提点建议并书写刊名，郭老表示，他希望“把杂志办成像英国的 *Nature*、美国的 *Scientific American* 那样世界一流的科学期刊”。由于郭老当时已无力著书，“自然杂志”几个字便由他的秘书从他以往的墨迹中选字集成，并给郭老看过认可。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钱三强先生在纪念册上留言：“加强基础科学研究、普及现代科学知识和广泛进行科学交流。”

由于期刊的出版正好赶上了文革后百废待兴、科教兴国的大好形势，一时间各学科的名家力作、优质稿件纷至沓来，发行量也一度接近10万份。在这些踊跃投稿的名家里，钱学森来稿最勤，名列第二，共7篇（第一名是杨振宁，12篇）。他的稿件不仅有关于自动控制和系统科学方面的论述，还有多篇有关人体科学的见解，如《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与人体科学》(1981)，《开展人体科学的基础研究》 (1981)，《建立唯象气功学——当前气功科学研究的一项任务》 (1986)，《对人体科学研究的几点认识》(1991)，《关于〈第二次成人过程原理〉的通信》 (1991)，等等。特别是1980年6月4日上午，钱学森有机会来沪之时，亲临《自然杂志》

收稿日期：2010-08-09
作者简介：林凤生，编审，曾供职于上海大学《自然杂志》，现已退休，Email：linfengs2008@sina.com。

编辑部看望刊社编辑人员，与大家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并合影留念。钱学森认为一个科学刊物，应该有自己的特色。可惜当时笔者尚未加盟，没能亲历这一盛事，殊为遗憾。后来，我当编辑后也曾多次想约请钱老撰稿，可惜此时他年事已高，未能践约。直到2005年，我约请了钱老的大弟子戴汝为院士写了一篇纪念钱学森归国50周年的文章，才算了却了自己的一个夙愿。

话分两头。且说光阴似箭，不觉已到1994年的年底，眼看明年新刊就要亮相，但稿件的分量尚嫌不足。钱伟长校长闻讯后便把他在上海市非线性科学会上的发言《谈谈非线性科学》交给《自然杂志》发表，让我们很受鼓舞。此文成了《自然杂志》复刊后的卷首篇。其中关于数学工具与工程技术关系的论述给我印象最深。他说：“做一番事业，用的工具要恰到好处，目的是解决问题。就像屠夫杀猪要用好刀，但这把刀刚好就行，不要整天磨刀、欣赏刀，磨得多好啊！那是刀匠的事。”钱校长戏谑说，“不要做刀匠，要做屠夫。去找最合适的刀，去杀最难的问题。”我想，这段话无论是对工程技术人员，还是对普通大众都是很有启发的。

1997年5月，钱校长在百忙之中会见了《自然杂志》的部分编辑人员，我那天正好外出，赶到“乐乎楼”时，座谈会早已开始。我说自己组稿没有碰到人，来晚了。钱老听了说：“明天我应邀出席叶企孙铜像揭幕仪式，届时有许多科学家在场，这个时候你们去找人，他们就躲不开了。”由于我的迟到，没能参加上会前与钱校长的合影，钱老可能意识到我的愿望，在座谈会结束时特意走到我跟前与我握了一下手。感谢校办的同志，为我留下了这个珍贵的瞬间。临别时，钱老还表示如果有合适的机会，他也会亲自出马帮杂志组稿。我当时还觉得，这些话也许是钱老对我们的一种鼓励，说说罢了。孰知没隔多久，校办就转来了几篇文稿，一篇是他专门为此赶写的《怀念我的老师叶企孙教授》，另外他还亲自约了李正道和徐利智二位名家的大稿，这些稿件后来都被《自然杂志》作为特约专稿及时发表了。1998年《自然杂志》出版20周年时，钱校长挥毫题词：“发扬创新精神，繁荣科学事业。”(图1) 2008年自然杂志出版30周年时，尽管此时钱老年事已高，身体也大不如以前，但仍不忘给我们写了祝贺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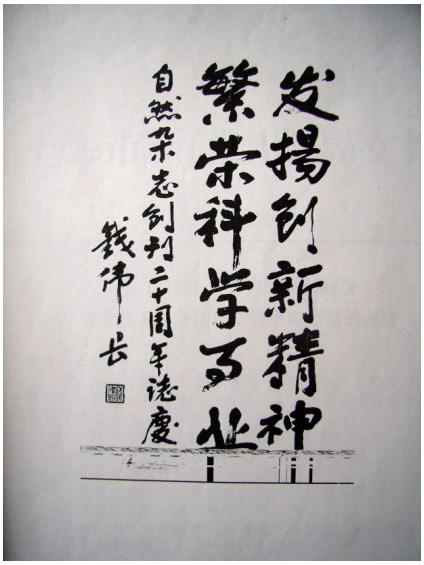


图1

回顾“三钱”对《自然杂志》的期望和关怀，我不由思绪万千，三位钱老虽然说法不同（钱三强说交流，钱学森说特色，钱伟长说创新），实际上却表达了同一个意思：高级科普期刊在传播科学新知的同时，更要鼓励创新意识和百家争鸣。钱学森还身体力行，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多篇探索人体科学和气功机理的文章，在他的支持下《自然杂志》开设了“人体科学”、“探索与假说”、“争鸣”等栏目，先后发表了100多篇相关文章，并与中央和上海电视台合作做过人体特异功能的实况转播，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自然杂志》的这些活动还得到了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同志的首肯，1988年《自然杂志》创刊20周年时，他亦亲笔题词表示祝贺。然而，当1995年我们参加办刊时，钱三强先生已经去世，而钱学森先生和钱伟长先生也都已是耄耋老者，而我们做具体工作的则人微言轻，看到有争议的来稿，唯恐避之不及，生怕被人说是在宣传伪科学，从而使杂志的创新和争鸣功能缺失，沦为一本泛泛介绍所谓科学新知的平庸刊物。笔者浅见，中国的高级科普期刊要想进入世界科技名刊之林，必须呼唤“三钱”精神的回归！